

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研究

——基于 CHARLS 数据的证据

江克忠 裴育 夏策敏*

摘要: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项目 2008 年先导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中国家庭代际转移呈现向上转移和隔代向下转移的特征: 即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获得子女不菲的经济帮助, 老年人对孙辈提供经济帮助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同时, 基于 Heckman 两步估计法的研究结果表明, 成年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与父母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拒绝了无私动机假说, 而支持了交换动机假说。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养老保障不会对家庭代际转移产生“挤出”效应, 未来加大政府养老保障的范围和力度, 同时创造条件促进子女对老年父母提供经济帮助, 可以共同有效改善老年人的福利水平。

关键词: 代际转移 无私动机 交换动机

一、引言

伴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卫生事业的改善,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中国人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老去。2011 年, 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2.8%; 到 2050 年, 该比重将高达 33.9% (United Nations et al. 2011)。同时, 中国经济虽然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但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呈“未富先老”的趋势。

中国现阶段虽然已经建立起多层次、多种制度并存的正式养老保障体系, 但是, 目前大部分老年人仍游离于正式的养老保障体系之外 (新华网 2012)。而且, 未来中国正式养老保障的主要特征应该是: 广覆盖、低水平; 由政府提供的正式养老保障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家庭养老还必须长期共存, 互相补充 (郑秉文 2011)。

政府养老保障体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 对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现状和动机进行深入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原因在于: 政府养老保障可能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或“挤入”效应。如果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帮助受无私动机驱动, 则家庭的代际转移可能被政府养老保障所代替, 即所谓的“挤出”效应, 政府的制度安排有可能偏离其目标; 反之, 如果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帮助受交换动机驱动, 则政府养老保障会刺激家庭代际转移的规模, 即所谓的“挤入”效应, 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会得到显著改善。

二、文献综述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家庭代际转移的现象都非常普遍, 但是转移的模式存在差异。在发达

* 江克忠, 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211815, 电子信箱: jiangkezhong2012@163.com; 裴育, 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211815, 电子信箱: peiyu6676@yahoo.com.cn; 夏策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 200433, 电子信箱: xcm1105@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劳动力转移刚性、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11CJY015)、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与公共品供给”(12YJC790076)、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审计科学与技术”(PAPD-AST)的资助。作者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供 CHARLS 数据,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 文责自负。

国家 政府养老保障体系完善 ,而且保障水平较高 ,更普遍的是父母为成年子女提供经济帮助(Gale and Scholz ,1994; Hurd et al. 2007; Rosenzweig and Wolpin 2007) 。而发展中国家 政府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 ,子女成为父母养老的重要保障 ,更多的是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Nugent ,1985; Lee et al. ,1994; Kim 2010) 。

有关代际转移的动机 ,现有的文献主要关注无私动机假说(altruism motive hypothesis) 和交换动机假说(exchange motive hypothesis) 。其中 ,Becker(1974) 提出了无私动机假说 ,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具有利他取向的情感 ,家庭代际转移是出于最大化家庭利益来分配和管理资源。Cox(1987) 对 Becker(1974) 的模型进行了拓展 ,提出了交换动机假说。在交换动机模型中 ,转移接收方为转移提供方提供了服务 ,作为交换 ,代际转移是转移提供方对所接受的相关服务的货币支付。而且 ,Cox(1987) 总结了判定代际转移动机的标准: 当转移规模与转移接受方收入水平负相关时 ,可能是受无私动机或交换动机的驱动; 但只有在交换动机驱动下 ,转移规模才与转移接受方收入水平正相关; 同时 ,还辅以其他的条件: 无论是受无私动机还是交换动机驱动 ,代际转移发生的概率与转移接收方收入水平负相关 ,与转移提供方收入水平正相关。实证研究中 ,Cox (1987) 、Cox 和 Rank(1992) 对美国的研究 ,Cox 等(1998) 对秘鲁的研究 ,支持了交换动机假说。McGarry 和 Schoeni(1995) 对美国的研究 ,支持了无私动机假说。而 Knowles 和 Anker(1981) 对肯尼亚的研究、Lucas 和 Stark(1985) 对博兹瓦纳的研究、Altonji 等(1997) 对美国的研究 ,既不支持无私动机假说 ,也不支持交换动机假说 ,即发现代际转移的混合动机。

有关中国家庭代际转移动机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理论上 ,姚远(1998) 、王跃生(2008) 等认为 ,在老龄化进程加快、家庭规模缩小和人口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 ,中国家庭养老日益表现出行为模式的特征 ,除了抚养 - 赡养关系外 ,还存在交换关系。实证研究中 ,陈皆明(1998) 发现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与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照看孩子、做家务等)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Secondi(1997) 的研究表明中国家庭代际转移规模与接受方收入水平正相关 ,即转移更多出于交换动机。Liu 和 Reilly(2004) 的研究发现 ,农民工对家庭汇款的规模与汇款接受方的收入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既不支持无私动机假说 ,也不支持交换动机假说。Cai 等(2006) 的研究发现 ,当退休工人处于一个足够低的收入水平时 ,子女对其提供经济帮助受无私动机驱动。但是 ,由于调查数据存在缺陷 ,Secondi(1997) 、Liu 和 Reilly(2004) 、Cai 等(2006) 都混淆了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和代内转移(intragenerational transfers) 。其中 ,Secondi(1997) 的调查中 ,代际转移是指非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汇回或带回的收入 ,包括了大量到城市打工的成年男性对留守农村的妻子和亲属的经济帮助。Liu 和 Reilly(2004) 的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离家很久的农民工 ,有关家庭信息的准确可靠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 ,代际转移也包括了农民工对留守农村的妻子和亲属的代内转移。Cai 等(2006) 所使用的代际转移数据中包括了来自朋友和亲戚的经济帮助。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项目 2008 年的先导调查数据 ,克服了调查数据的缺陷 ,在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综合考察了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现状 ,重点研究了成年子女(家庭) 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动机。

三、实证研究

(一) 数据来源

CHARLS 项目在于收集一套代表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 ,用以分析人口老龄化问题。2008 年的先导调查数据 ,在甘肃和浙江两省进行 ,调查提供了 1 569 户家庭和 2 685 个人 ,以及受访家庭 4 391 个子女的信息。

(二) 代际转移的模式

CHARLS 问卷中包括了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 与父辈(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健在的父母) 的经济往来、与子女的经济往来、与孙辈(主要受访者子女) 的经济往来。本文针对与主要受访者家庭有经济往来的同一对象 ,以主要受访者家庭得到的经济帮助与提供的经济帮助的净值来衡量代际转移的方向。总体上 ,中国家庭代际转移呈现向上转移和隔代向下转移的特征: 在与健在父辈的经济往来中 ,96. 03% 的家庭为父辈提供了经济帮助; 在与子女的经济往来中 ,90. 46% 的家庭获得了子女的经济帮助; 在与孙辈的经济往来

中 86.91% 的家庭为孙辈提供了经济帮助(见表 1)。

表 1 代际转移模式及描述性统计

代际转移类型	代际转移模式	均值	样本数	百分比
与健在父辈经济往来	提供经济帮助	984.20	484	96.03%
	接受经济帮助	3657.50	20	3.97%
	全部样本	800.01	504	
与子女经济往来	提供经济帮助	9753.41	205	9.54%
	接受经济帮助	1468.21	2148	90.46%
	全部样本	490.55	2353	
与孙辈经济往来	提供经济帮助	599.13	757	86.91%
	接受经济帮助	589.34	114	13.09%
	全部样本	443.58	871	

(三) 代际转移的动机

1. 计量模型的选择

本文选择 Heckman(1979) 的两步估计法进行实证研究。首先,考察代际转移发生的概率,即子女是否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其次,考察代际转移的动机,即在子女已经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前提下,转移的规模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对代际转移发生概率的研究,建立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计量模型如下:

$$d_i^* = \alpha_0 + \alpha_1 Y_i + \alpha_2 x_i^1 + \mu_i$$

其中 d_i^* 为潜变量,如果子女对父母提供了经济帮助,即 $d_i^* > 0$ 时 $d_i = 1$; 如果子女没有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或者获得了父母提供的经济帮助,即 $d_i \leq 0$ 时 $d_i = 0$ 。 Y_i 指发生代际转移前父母的收入水平,向量 x_i^1 包含了 Y_i 之外的所有其他解释变量。根据 Cox(1987) 的论证,无论是基于无私动机还是交换动机 $\alpha_1 < 0$ 。

在已发生代际转移的情况下,考虑到选择性偏差,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T_i^* = \beta_0 + \beta_1 Y_i + \beta_2 x_i^2 + \varepsilon_i$$

当 $d_i = 1$ 且 $T_i^* > 0$ 时,潜变量 T_i^* 等于实际观察到的代际转移规模 T_i ; 否则, $T_i = 0$ 。向量 x_i^2 与 x_i^1 类似,包含了 Y_i 之外的所有其他解释变量。根据 Cox(1987) 的论证,在无私动机驱动下, $\beta_1 < 0$; 在交换动机驱动下 $\beta_1 > 0$ 。

使用 Heckman 两步估计法需要解决模型的识别问题(Greene 2008)。Escanciano 等(2010)认为模型识别可以通过模型的设置形式予以解决,即某些解释变量在 Probit 模型中影响是非线性的,而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中影响是线性的。考虑所面临的经济约束,子女在中年时期收入可能较高,其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可能也较高,而在年轻和老年时期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可能较低;而当子女有能力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时,则转移的规模可能不受年龄的影响。本文采用非参数局部加权回归方法(lowess)对以上假设进行检验,发现:代际转移发生的概率与子女年龄呈倒 U 型关系(图 1); 而代际转移的规模与子女年龄呈接近水平状的关系(图 2); 说明子女年龄可以作为识别模型的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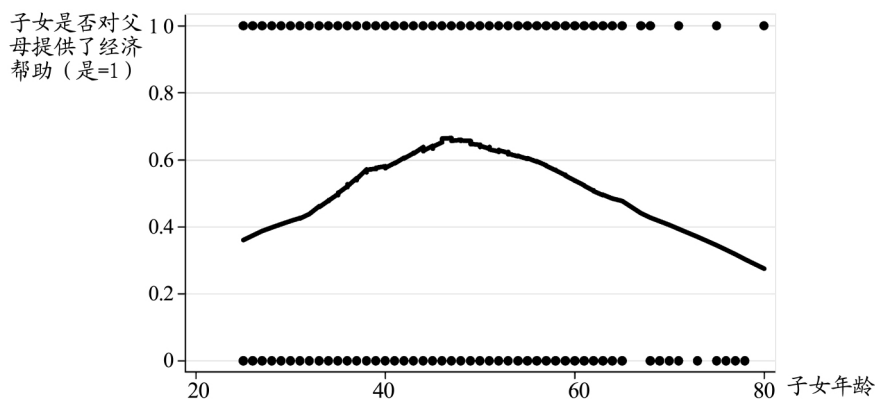


图 1 代际转移概率与子女年龄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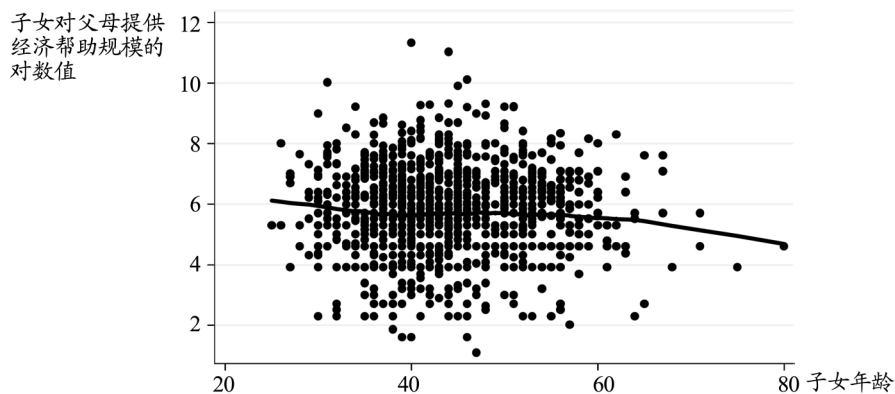


图2 代际转移规模与子女年龄关系图

2. 样本和变量选择

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 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至少有一个的年龄大于60岁(含60岁)。(2) 考虑到子女年龄较小或正在上学时,没有能力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选择子女的年龄大于25岁(含25岁)、且非全日制脱产学生。(3) 选择非家庭成员的成年子女作为研究对象。

在传统的研究中,研究家庭代际转移都是考察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经济往来,忽视了父母与子女的子女(即孙辈)的经济往来对亲子经济往来的影响,有可能高估或低估代际转移的规模,进而错误判断代际转移的动机。例如,部分成年子女家庭中孙辈会代替其父母对主要受访者家庭提供经济帮助;或者,部分成年子女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帮助受父母是否对孙辈提供经济帮助的影响。而且,在中国普遍存在“隔代亲”的现象,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考察与父母没有共同居住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转移;第二,考察与父母没有共同居住的成年子女家庭与父母之间的代际转移。

在符合条件的678个家庭中,69.32%的家庭获得了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30.68%的家庭没有获得或者为子女提供经济帮助;而且,获得了子女经济帮助的受访者家庭的人均纯收入、父母的总收入等都低于没有获得子女经济帮助的家庭(见表2)。同时,在符合条件的2129个子女中,58.06%的子女对父母提供了经济帮助,41.94%的子女没有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或获得了父母经济帮助(见表3)。也就是说,在中国,大多数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了经济帮助;而且,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父母更有可能得到子女的经济帮助。

表2 家庭代际转移及主要受访者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全样本	获得经济帮助	没有获得经济帮助	P 检验值
代际转移规模(元)				
与子女之间转移	2358.66	3464.78	140.75	0.0000
与子女家庭之间转移	2144.47	3214.31	272.96	0.0000
转移前家庭人均收入(元)				
不包含政府转移	5168.22	4872.40	5836.66	0.2562
包含政府转移	5550.00	5273.18	6175.51	0.2928
转移前父母总收入(元)				
不包含政府转移	8817.28	8236.50	10129.63	0.1992
包含政府转移	9414.77	8857.35	10674.32	0.2258
转移前家庭总收入(元)				
不包含政府转移	15465.92	14085.26	18585.69	0.0907
包含政府转移	16311.58	14952.97	19381.52	0.0983
家庭人均资产(元)	56990	64682	39607	0.1207
年龄	69.85	70.19	69.09	0.0602
男性	46.46%	44.04%	51.92%	0.0579
已婚并与配偶同居	56.19%	54.89%	59.13%	0.3054
有成年子女共同生活	41.89%	36.81%	53.37%	0.0001

续表 2

家庭代际转移及主要受访者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全样本	获得经济帮助	没有获得经济帮助	P 检验值
成年子女数	3.71	3.94	3.17	0.0000
农村户口	81.56%	81.48%	81.73%	0.9405
文盲	55.31%	54.68%	56.73%	0.6211
小学毕业及以下	34.96%	35.53%	33.65%	0.6368
初中及以上	9.73%	9.79%	9.62%	0.9446
家庭总人口	3.18	3.00	3.59	0.0000
甘肃	47.49%	45.96%	50.96%	0.2295
患有慢性病	77.88%	77.87%	77.88%	0.9972
患有残疾	19.47%	19.79%	18.75%	0.7535
自评健康非常不好	25.96%	27.23%	23.08%	0.2555
喝酒	32.15%	32.98%	30.29%	0.4899
抽烟	21.98%	21.28%	23.56%	0.5090
样本数	678	470	208	

说明: (1) 与子女之间转移指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获得的所有子女的经济帮助的总和,与子女家庭之间转移指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获得的所有子女家庭成员的经济帮助的总和,即包括了与孙辈之间的经济来往;(2) 受访者发生转移前家庭收入包括所有家庭成员工资薪金收入、自雇收入、农业收入、退休金收入和净资产收入,受访者家庭资产包括房产、有形资产和金融资产;(3) P 检验值指单因素(one-way)方差分析的 P 检验值,以检验相关变量的平均值在获得经济帮助和没有获得经济帮助的样本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 3

子女对父母的代际转移及子女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全样本	提供经济帮助	没有提供经济帮助	P 检验值
对父母的转移规模				
子女单独对父母转移	503.80	887.53	27.31	0.0000
子女家庭对父母转移(含孙辈)	467.14	884.05	64.24	0.0000
年龄	43.15	43.70	43.39	0.0003
男性	48.52%	49.76%	46.81%	0.1793
农村户口	73.84%	70.87%	77.94%	0.0002
居住地点				
与父母同村或同社区	38.61%	37.86%	39.64%	0.4060
本县其他村或社区	43.78%	45.23%	41.77%	0.1127
外省等	17.61%	16.91%	18.59%	0.3156
教育水平				
文盲	18.32%	14.40%	23.74%	0.0000
非文盲且最高学历小学毕业	35.98%	36.08%	35.83%	0.9057
初中毕业及以上	45.70%	49.52%	40.43%	0.0000
已婚并与配偶同居	94.03%	95.47%	92.05%	0.0010
成年子女数	1.10	1.12	1.06	0.2555
未成年子女数	0.67	0.61	0.74	0.0010
父母有照顾未成年子女	7.42%	7.36%	7.50%	0.9030
有工作	80.79%	80.91%	80.63%	0.8719
样本数	2 129	1 236(1 193)	893(936)	

说明: (1) 子女家庭对父母的转移规模数据中,总样本数为 2 129,提供经济帮助的样本数为 1 193,没有提供经济帮助或获得经济帮助的样本数为 936;(2) P 检验值指单因素(one-way)方差分析的 P 检验值,以检验相关变量的平均值在提供经济帮助和没有提供经济帮助的样本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作为转移接收方,父母收入水平是检验代际转移动机的重要解释变量,本文以发生转移前主要受访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来衡量其收入水平。同时,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控制解释变量:主要受访者的家庭人均资产;主要受访者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否有成年子女与其共同生活、成年子女数、户籍、教育水平、家庭总人口、居住地(甘肃或浙江);衡量主要受访者健康状况及生活方式变量:是否患有慢性病、自评健康状况、是否残疾、是否抽烟、是否喝酒。

理论上,无论是基于无私动机还是交换动机,随着子女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和规模都相应增加。遗憾的是,CHARLS 没有提供子女收入水平的调查数据,本文选择子女的其他特征变量

作为控制解释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户籍、居住地点、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成年子女数、未成年子女数、是否有工作等;同时,中国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一个常见的服务是帮忙照顾未成年孙辈,本文将父母是否为子女照顾未成年子女(主要受访者的孙辈)作为一个控制解释变量。

3. 实证研究结果

选择方程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表明:单独考察子女对父母的代际转移,父母获得子女经济帮助的概率与其收入负相关,但是不显著;但是考察子女家庭对父母的代际转移,父母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概率与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经济状况不佳的老年父母更可能获得子女的经济帮助。同时,当主要受访者成年子女数越多时,其获得成年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上升。可能的原因在于,子女家庭对父母的经济帮助存在示范效应或攀比效应。当主要受访者的配偶还健在并一起生活时,子女家庭对其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提高。主要受访者有成年子女与其共同生活时,其获得非家庭成员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下降。这是因为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子女承担了照顾父母的责任,非共同居住子女家庭减少了对父母的经济帮助。主要受访者年龄越大,子女家庭对其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可能更需要子女对其提供非经济帮助(生活上的照顾),而经济帮助和非经济帮助可以相互替代。当主要受访者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时,其可以获得家庭内部其他成员的帮助,非共同居住子女家庭对其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下降。相比浙江省,生活在较贫困地区的甘肃省的主要受访者,其子女家庭经济状况可能也相对较差,因而父母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下降。主要受访者患有残疾时,其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概率也越高;同时,当主要受访者有抽烟或喝酒的习惯时,其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概率也越高。

转移方程 Heckman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表明:主要受访者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规模与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子女家庭对父母的代际转移出于交换动机。家庭人均资产越多的主要受访者,其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规模也越大;当主要受访者的配偶还健在并一起生活时,其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规模显著下降;生活在较贫困地区的甘肃省的主要受访者,其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规模显著下降。同时,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其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上升,但增长速度逐渐下降;子女教育水平越高,其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也越大。由于年龄和教育水平是决定子女收入水平的重要变量,说明收入水平越高的子女,对父母进行代际转移的概率也越高。与父母居住在同一村庄或者同一社区的子女家庭相比,居住在本县其他村庄或社区的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显著下降。

表4 模型回归结果

主要受访者特征变量	选择方程 Probit 模型				转移方程 Heckman 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家庭人均收入(千元)	-0.00177 (-0.53)	-0.00181 (-0.54)	-0.00617* (-1.85)	-0.00629* (-1.87)	26.93** (2.16)	25.02** (1.99)	39.77** (2.44)	35.77** (2.18)
家庭人均资产(千元)	0.000284* (1.68)	0.000333* (1.96)	0.000203 (1.27)	0.000251 (1.56)	26.93** (2.16)	25.02** (1.99)	39.77** (2.44)	35.77** (2.18)
成年子女数	0.0921*** (4.61)	0.0975*** (4.84)	0.0906*** (4.57)	0.0963*** (4.81)	0.0409 (1.06)	0.0480 (1.24)	0.0305 (0.80)	0.0374 (0.97)
成年子女共同生活	-0.262*** (-2.74)	-0.285*** (-2.96)	-0.164* (-1.72)	-0.188* (-1.96)	-323.2 (-0.62)	-428.9 (-0.80)	-435.9 (-0.96)	-490.3 (-1.04)
年龄	-0.039*** (-6.94)	-0.040*** (-7.08)	-0.038*** (-6.88)	-0.040*** (-7.08)	6.181 (0.11)	-9.026 (-0.16)	4.942 (0.08)	-8.356 (-0.14)
农村户口	-0.00908 (-0.09)	-0.0262 (-0.25)	0.0332 (0.32)	0.0151 (0.15)	-131.2 (-0.38)	-169.1 (-0.49)	-138.9 (-0.39)	-162.1 (-0.45)
男性	0.0931 (1.34)	-0.0306 (-0.39)	0.0804 (1.17)	-0.0401 (-0.51)	72.92 (0.27)	-1.430 (-0.01)	105.3 (0.38)	7.038 (0.02)
小学及以下学历	-0.0101 (-0.14)	-0.00503 (-0.07)	-0.0719 (-0.97)	-0.0690 (-0.93)	-65.31 (-0.26)	-58.00 (-0.23)	-23.27 (-0.08)	-37.47 (-0.14)
初中及以上学历	0.0136 (0.11)	0.0147 (0.12)	-0.0339 (-0.28)	-0.0345 (-0.29)	-608.1 (-1.53)	-615.4 (-1.54)	-633.2 (-1.51)	-654.2 (-1.56)

续表 4

模型回归结果

	选择方程 Probit 模型				转移方程 Heckman 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已婚并共同居住	0.0917 (1.43)	0.111* (1.71)	0.0931 (1.46)	0.114* (1.77)	-507.8* (-1.96)	-466.3* (-1.74)	-524.1* (-1.92)	-484.7* (-1.70)
家庭人口数	-0.0607** (-2.14)	-0.0616** (-2.15)	-0.0789*** (-2.78)	-0.0793*** (-2.78)	148.0 (1.12)	116.1 (0.90)	153.5 (0.96)	115.6 (0.76)
甘肃	-0.143** (-2.06)	-0.175** (-2.43)	-0.146** (-2.12)	-0.181** (-2.55)	-744.1** (-2.41)	-804.7** (-2.39)	-707.1** (-2.12)	-761.1** (-2.07)
患有慢性病		-0.0503 (-0.70)		-0.0496 (-0.70)		-36.23 (-0.15)		-52.60 (-0.21)
患有残疾		0.154** (2.03)		0.185** (2.46)		-223.7 (-0.70)		-233.8 (-0.64)
自评健康非常不好		0.0326 (0.47)		0.0112 (0.16)		91.60 (0.39)		114.8 (0.48)
饮酒		0.207** (3.08)		0.156** (2.36)		29.97 (0.09)		38.86 (0.12)
抽烟		0.186** (2.26)		0.206** (2.52)		268.8 (0.71)		298.8 (0.71)
子女特征变量								
年龄	0.0849*** (4.98)	0.0869*** (4.98)	0.0842*** (4.96)	0.0876*** (5.05)	-17.14 (-0.46)	-6.942 (-0.19)	-16.57 (-0.39)	-6.485 (-0.16)
年龄平方项	-0.00067*** (-3.75)	-0.0007*** (-3.82)	-0.00065*** (-3.63)	-0.00069*** (-3.76)				
男性	-0.0523 (-0.77)	-0.0432 (-0.64)	-0.0720 (-1.08)	-0.0636 (-0.95)	53.03 (0.23)	22.55 (0.10)	61.27 (0.25)	21.28 (0.09)
居住本县其他村社区	0.0390 (0.56)	0.0487 (0.69)	0.0164 (0.24)	0.0281 (0.40)	-428.9* (-1.82)	-434.4* (-1.82)	-427.4* (-1.79)	-449.1* (-1.85)
居住外省	-0.0628 (-0.74)	-0.0676 (-0.79)	-0.0438 (-0.52)	-0.0473 (-0.56)	24.71 (0.08)	-42.89 (-0.14)	-6.546 (-0.02)	-67.96 (-0.21)
农村户口	-0.156* (-1.65)	-0.161* (-1.70)	-0.134 (-1.44)	-0.138 (-1.47)	-223.2 (-0.61)	-262.0 (-0.73)	-221.6 (-0.60)	-245.2 (-0.67)
已婚并共同居住	0.233* (1.87)	0.234* (1.86)	0.204 (1.64)	0.197 (1.58)	-201.9 (-0.32)	-46.38 (-0.08)	-144.3 (-0.23)	-14.28 (-0.02)
小学及以下学历	0.294*** (3.42)	0.302*** (3.50)	0.274*** (3.20)	0.283*** (3.28)	-81.90 (-0.15)	59.06 (0.11)	-15.20 (-0.03)	105.3 (0.20)
初中及以上学历	0.393*** (4.22)	0.407*** (4.33)	0.369*** (3.97)	0.382*** (4.09)	476.8 (0.71)	680.8 (1.03)	510.7 (0.74)	692.5 (1.02)
成年子女数	0.0409 (1.06)	0.0480 (1.24)	0.0305 (0.80)	0.0374 (0.97)	-3.415 (-0.02)	6.974 (0.05)	18.75 (0.13)	22.45 (0.15)
未成年子女数	-0.0426 (-0.92)	-0.0394 (-0.85)	-0.0486 (-1.06)	-0.0440 (-0.96)	46.34 (0.26)	11.78 (0.07)	49.06 (0.26)	11.36 (0.06)
有工作	0.0720 (0.96)	0.0772 (1.02)	0.0610 (0.81)	0.0667 (0.89)	-174.3 (-0.62)	-121.6 (-0.43)	-202.3 (-0.71)	-156.0 (-0.54)
父母照顾未成年子女	0.0505 (0.45)	0.0470 (0.41)	0.0229 (0.20)	0.0178 (0.16)	-259.9 (-0.66)	-234.5 (-0.60)	-247.2 (-0.60)	-232.0 (-0.57)
常数项					2647.1* (1.68)	2503.0 (1.56)	2362.9 (1.45)	2196.8 (1.32)
样本数	2129	2129	2129	2129	2129	2129	2129	2129

说明:(1)模型(1)和(2)以父母是否获得子女经济帮助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3)和(4)以父母是否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作为被解释变量;(2)模型(5)和(6)以父母获得的子女经济帮助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7)和(8)以父母获得的子女家庭经济帮助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3)主要受访者和子女的教育水平都以文盲为参照组;(4)子女居住地点以子女与主要受访者居住在同一村庄或同一社区为参照组;(5)括号内为t检验值,其中,*、**、***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4. 家庭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为了控制主要受访者不同子女不可观测因素对代际转移的影响,本文采用家庭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

研究,进而比较主要受访者不同子女家庭对父母代际转移特征。在家庭固定效应模型样本选择中,剔除掉主要受访者只有一个非同居住的成年子女的样本,得到 571 个家庭及 2 022 个子女的匹配数据。

家庭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5)表明: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其家庭对主要受访者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增大,但增长速度随年龄的增长显著下降;相对于城市户籍的子女,农村户籍的子女家庭对主要受访者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较低;相对于文盲组的子女,子女教育水平越高,其家庭对主要受访者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也显著增大;同时,当子女家庭中成年子女数越多时,该子女家庭对主要受访者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提高。

转移方程家庭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5)表明:相对于没有工作的子女,有工作的子女家庭对主要受访者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显著较高。对于父母有帮助照顾其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其家庭对主要受访者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反而越低,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方面,父母可能为子女提供了其他服务;另一方面,转移接受方提供的服务不限于转移发生的当期,还可能在转移发生后的年度内(Cox and Jimenez,1990)。

表 5 家庭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主要受访者变量特征	Logit 模型		转移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年龄	0.448*** (4.95)	0.408*** (4.68)	-4.666 (-0.33)	-4.133 (-0.29)
年龄平方项	-0.00412*** (-4.48)	-0.00368*** (-4.13)		
男性	0.0348 (0.19)	-0.0353 (-0.19)	4.370 (0.03)	-17.85 (-0.10)
居住本县其他村或社区	0.0348 (0.17)	0.0586 (0.30)	40.73 (0.22)	51.10 (0.28)
居住外省	-0.252 (-0.99)	-0.279 (-1.12)	171.1 (0.74)	182.0 (0.78)
农村户口	-0.648** (-2.07)	-0.550* (-1.83)	-138.7 (-0.48)	-162.7 (-0.56)
已婚并共同居住	0.185 (0.55)	0.202 (0.59)	93.77 (0.29)	35.56 (0.11)
小学及以下学历	0.602** (2.24)	0.642** (2.37)	27.86 (0.11)	31.07 (0.13)
初中及以上学历	0.481 (1.53)	0.551* (1.77)	405.2 (1.43)	414.2 (1.46)
成年子女数	0.210* (1.90)	0.189* (1.74)	30.84 (0.31)	27.50 (0.27)
未成年子女数	-0.101 (-0.74)	-0.116 (-0.87)	37.07 (0.32)	37.52 (0.33)
有工作	0.256 (1.04)	0.226 (0.93)	394.2* (1.76)	387.4* (1.72)
父母有照看未成年子女	0.0108 (0.03)	-0.148 (-0.43)	-444.6 (-1.41)	-521.8* (-1.65)
常数项			147.0 (0.19)	172.2 (0.22)
样本数	2022	2022	2022	2022

说明:(1)模型(1)以父母是否获得子女的经济帮助为被解释变量,模型(2)以父母是否获得子女家庭的经济帮助为被解释变量;(2)模型(3)以父母获得的子女经济帮助规模为被解释变量,模型(4)以父母获得的子女家庭经济帮助规模为被解释变量;(3)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四、简要结论

本文使用 2008 年 CHARLS 先导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综合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简要结论:

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呈现向上转移和隔代向下转移的特征。其中,收入水平较低的老年父母得到了子女不菲的经济帮助;同时,老年人对孙辈提供经济帮助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综合考察子女家庭对父母的代际转移,收入水平越低、患有残疾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较高。子女家庭对父母的代际转移具有示范效应或攀比效应,即老年人子女越多,各子女家庭对其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也

越高;在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少子化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

相对于城镇户籍的子女,农村户籍的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较低;而且,子女教育水平越高,其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也越高;相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省,在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甘肃省,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较低。说明子女家庭经济状况是制约其是否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家庭代际转移总体呈现交换动机的特征。即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与父母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持有资产越多的父母,其获得子女家庭经济帮助的规模也越大。家庭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没有工作的子女,有工作的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较高;对于父母有帮助照顾其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其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反而越低。进一步说明子女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代际转移规模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正式的养老保障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家庭养老还需要长期共存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府养老保障不会对家庭代际转移产生“挤出”效应。所以,未来不断加大政府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和保障力度,可以显著改善中国老年人口的福利水平。同时,子女收入水平是影响其是否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以及提供经济帮助规模的重要因素,可以从个人所得税等制度改革入手,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创造条件提高劳动力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激励其对老年父母提供经济帮助。

参考文献:

1. 陈皆明,1998 《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2. 王跃生,2008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人口研究》第4期。
3. 新华网,2012年10月2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insurance/n/2012/1026/c223018-19397834.html。
4. 姚远,1998 《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人口研究》第5期。
5. 郑秉文,2011 《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6. Altonji J. G., F. Hayashi, and L. J. Kotlikoff. 1997. "Parent Altruism and Inter Vivos Transfer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6): 1121 - 1165.
7. Becker, G. S. 1974.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6): 1063 - 1093.
8. Cai F., J. Giles, and X. Meng. 2006. "How Well Do Children Insure Parents against Low Retirement Income? An Analysis Using Survey Data from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0(12): 2229 - 2255.
9. Cox, D. 1987.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5(3): 508 - 546.
10. Cox, D., and E. Jimenez. 1990. "Achieve Social Objectives through Private Transfers: A Review."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5(2): 205 - 218.
11. Cox, D., and M. R. Rank. 1992. "Inter - Vivo Transf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4(2): 305 - 314.
12. Cox, D., Z. Eser, and E. Jimenez. 1998. "Motives for Private Transfers over the Life Cycl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Evidence for Peru."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5(1): 57 - 80.
13. Escanciano J. C., D. Jacho - Chavez, and A. Lewbel. 2010.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emiparametric Two Step Model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pps. Olin. Wustl. edu.
14. Gale, W. G., and J. K. Scholz. 1994.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4): 145 - 160.
15. Greene, W. H. 2008. *Econometric Analysis*. 6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16. Heckman, J. 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47(1): 153 - 161.
17. Hurd, M. D., J. P. Smith, and J. M. Zissimopoulos. 2007. "Inter - vivos Giving over the Life Cycle." RAN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WR - 524.
18. Kim, H. 2010.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Old - Age Security in Korea." I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emographic Change in East Asia*, NBER - EASE, Vol. 19, ed. Takatoshi Ito and Andrew Rose, 227 - 2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 Knowles, J. C., and R. Anker. 1981. "An Analysis of Income Transfer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ase of Keny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205 - 226.
20. Lee, Y., W. L. Parish, and R. J. Willis. 1994.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4): 1010 - 1041.
21. Liu, Q., and B. Reilly. 2004. "Income Transfers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Jinan." *Applied Economics* 36(12): 1295 - 1313.
22. Lucas, R. E. B., and O. Stark. 1985.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5): 901 - 918.
23. McGarry, K., and R. F. Schoeni. 1995. "Transfer Behavior in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Measurement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the Family."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0: 184 - 226.
24. Nugent, J. 1985. "The Old Age Security Motive for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1(1): 75 - 97.
25. Rosenzweig, M. R., and K. I. Wolpin. 1993.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the Life - Cycle Incomes of Young Men and Their

- Parent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Co - residence ,and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Transfers. ”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11(1) : 84 - 112.
26. Secondi G. 1997. “Private Monetary Transfers in Rural China: Are Families Altruistic?”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3(4) : 487 - 509.
27. Tobin J. 1958. “Estimation of Relationship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 *Econometrica* 26(1) : 24 - 36.
28.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ighlights and Advance Tables. ” Working Paper No. ESA/P/WP. 220.

The Patterns and Motiv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China: Evidence Based on CHARLS Data

Jiang Kezhong¹ ,Pei Yu¹ and Xia Cemi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2.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By utilizing 2008 CHARLS data ,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elderly parents with bad economic condition obtained lots of transfers from their adult children , at the same time , the elderly gave lots of transfers to their grandchildren. By using Heckman two - step estimation , we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transfers of adult children family giving to the elderly paren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parental income , which rejected the altruism motive hypothesis and support the exchange motive hypothesis. This paper also showed that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crow out”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Therefore , In the future , perfecting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as well as encouraging the adult children to help their parents , can work together effectively to improve the welfare of old population.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ltruism Motive; Exchange Motive

JEL Classification: J14

(责任编辑: 陈永清)

(上接第 19 页)

15. 任洲鸿、刘冠军 2008 《从“雇佣劳动”到“劳动力资本”——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8 期。
16. 任洲鸿、刘冠军 2010 《国内近年来关于劳动力资本化问题的研究述评》,《经济评论》第 6 期。
17. 任洲鸿 2011a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海派经济学》第 4 辑。
18. 任洲鸿 2011b 《试论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经济学家》第 3 期。
19. 舒尔茨 2001: 《报酬递增的源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维娜·艾莉 1998 《知识的进化》,中译本,珠海出版社。
21. 余光胜、毛荐其 2007 《技术创新中默会知识转移问题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第 2 期。
22. 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 2006 《创造知识的企业: 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中译本,知识产权出版社。
23. Arrow K. J. 1962. “The Economics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2) : 155 - 173.
24. McDermott John F. M. 2007. “Producing Power - labour. ” *Science & Society* ,71(3) : 299 - 321.
25. Paolo Virno. 2007. “General Intellect.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3) : 3 - 8.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Labor Capitalization: A Basic Theoretical Model

Ren Zhou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Knowledge - bas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apital - based production mode and acquired the nature of fixed capital. The comb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abor and knowledge - bas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feature the Knowledge Economy Age ,which gives rise to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nd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for Marxism theories of labor force commod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Based on the epoch features of Knowledge Economy Age and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makes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connotations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two - fold character of labor. It attempts to convert the accumulation of labor capital to that of the value of knowledge - bas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revealing and clarifying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from Marx ' s labor force commodity theory. A basic theoretical model of labor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been constructed with a view to enrich and develop Marx ' s theory of labor force commod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knowledge economy.

Key Words: Knowledge Accumulation; Labor Force Commodity; Knowledge - bas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Knowledge Capital; Labor Capital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B51 J24

(责任编辑: 彭爽)